

试论宋代农业信仰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陈伟庆,马国华^①

(暨南大学 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宋朝以农立国,故而与农业有关的诸神在宋人的信仰体系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农业信仰作为宋代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极为盛行。宋代农业信仰在调节民众心理、稳定社会秩序、丰富文化生活、加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

[关键词] 宋代; 农业; 民间信仰; 乡村社会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6-0073-04

中国自古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农业不仅关乎人民的生活,而且关乎政权的兴衰成败。在宋代,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农业技术水平比前代有了较大提高。农书的大量涌现,就是宋代农业技术进步理论化的显著标志之一。以往学者都十分关注宋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对宋代农业生产中的民间信仰的研究却较为薄弱。皮庆生先生已指出:“国内宋代民间信仰则比较沉闷,关注该领域的学者、研究成果都不太多。”^[1]宋朝以农立国,故而与农业有关的诸神在宋人的信仰体系中占有很重的分量。探讨宋代的农业信仰,对于了解宋代农耕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苑利先生所说的:农业信仰是农业民族的心理支柱,应当对其给予重视^[2]。在宋代,民间信仰与农耕生产有着密切联系,贯穿在整个农耕生产之中,并对农耕生产产生一定的影响。

早在农业社会开始时,农业信仰就已产生并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这在《诗经》等先秦史籍中多有记载。如《小雅·大田》诗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小雅·甫田》即为祭祀田祖、祈求雨水的乐歌,其诗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3]可见,早在商周时期,农业祭祀仪式就已被作为农事活动中重要的内容而举行。农业信仰的产生与早期农业社会的落后生产条件和认识水平直接相关。在古代社会,先民所固有

的万物有灵观,势必会渗透到农业生产活动领域,并往往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以致形成农事信仰。在宋代,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当人们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无能为力时,就会转向敬畏和祈求神灵,藉以安慰个人或群体不安的心灵,这就是宋代农业信仰盛行的根本原因。

在宋代,多神崇拜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北宋前期是历史上一个造神高峰期,朝廷大举为各地神明赐号封爵,其数量远超前代。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民间的崇神风气。到南宋初年,大臣韩肖胄即指出“祖宗以来,每岁大、中、小祀百有余所,罔敢废阙。”^[4]卷98、2426祭祀的各方神灵达一千几百个之多。宋朝以农立国,故而与农业有关的诸神在宋人的信仰体系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宋代民间有相当一部分神灵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关系,普通民众最关注的是土地神、水神、风伯、雨师、雷神等这些有着具体职能的神灵。人们认为这些神灵能够直接给农业生产带来利益或灾祸,只有他们才能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人们希望通过祈祷、祭祀来与支配自然界的神灵们沟通,通过这些仪式来取悦神鬼,帮助他们达成心愿。

在宋代,农田的丰歉很大一部分要靠雨水的多少。春夏之季正是农作物茁壮成长的季节,如果遇到干旱,农作物得不到灌溉,就会影响收成。夏秋之交,粮谷抽穗急需阳光晴晒时,如常逢连阴雨天,田间积涝成灾又是农耕的一大危害。梅尧臣《田家语》诗曰:“盛夏流潦多,白水高于屋。水既害我菽,

[收稿日期] 2012-10-16

[作者简介] 陈伟庆(1980-),男,广东云浮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①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蝗又食我粟。”^[5]可以说水在宋代农业生产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与人们的生存息息相关。两宋期间,水灾、旱灾为害十分严重。有学者统计,两宋时期共发生各类自然灾害 1543 次,其中水灾为 628 次,旱灾为 259 次。旱灾过后往往会引发蝗灾等农业生物灾害,两宋共发生虫灾 138 次。这三种自然灾害已占有所有自然灾害将近七成。单就北宋建立初到真宗乾兴元年(1022)为止的 63 年间,发生水灾 198 次,旱灾 76 次,虫灾 73 次,可见宋代与水相关的自然灾害之频繁^[6]。

如旱灾发生,农业生产便受到严重威胁,往往造成农作物减产或绝收,导致民众饥荒和死亡。如太宗端拱二年(989),“河南、莱登深冀旱甚,民多饥死”^{[4]卷66.1439}。一旦旱灾发生,人们多进行祈雨仪式以求雨。祈雨是围绕着农业生产、祈禳丰收的巫术活动。宋人对祈雨活动极为重视,在史籍中对宋代祈雨的记载非常之多。仁宗庆历四年(1044),因为久旱无雨,宋政府号召全国各级政府和民众进行祈雨祭祀活动。陈襄《祈雨》诗曰:“庆历甲申岁,旱极忧民田。农夫不得耕,相顾愁凶年。帝心恐民忧,诏遣祈山川。郡国举祀典,斋戒陈豆笾。望祭复雩龙,祷之必精虔。”^[7]可以说全国上至皇帝下至黎民,对祈雨仪式都极为重视。民间自发的祈雨活动就更是屡见不鲜。如李龔《赠野庙祈雨老巫》诗曰:“铜鼓祭龙云塞庙,对花歌咏似狂颠。”^[8]陆游诗曰:“老巫祈社雨,小妇饷春耕。”^[9]在宋代,为害最烈的虫灾乃是蝗灾。正如苏轼指出的“从来蝗旱必相资,此事吾闻老农语。”^[10]旱灾过后往往会出现蝗灾。蝗灾在宋代往往是属于毁灭性的农业生物灾害,一旦爆发,就会出现蝗飞蔽天、田禾俱尽、民饥流亡,甚至人食人的悲惨景象。在宋代,祭祀酺神被当做防治蝗虫的重要方法。如南宋初年,宋政府下令有蝗灾则祭酺神。“绍兴祀令:虫蝗为害,则祭酺神。”^{[4]卷103.2523}李纲《酺祭》诗曰:“闵旱意不乐,驾言游近垧。田父纷在野,祭酺方乞灵。借问何以然,东皋产蝗螟。主张有神物,薄礼羞微馨。”^[11]宋代不少文士都写过祭酺仪式的祝文。

二

在宋代,还有一些与农业生产较密切的行业神。如农神、蚕神、茶神、马祖等。行业神是从业者供奉的用来保护自己和本行业利益,并与行业特征有一定关联的神灵。每个行业所奉之神,或为祖师,或为保护神,世代相传,来源复杂。在古代社会,社为土地之神,稷为谷物之神,二者代表了农业之神。“社

稷”常被用来指称国家,其经济意义渐为其政治意义所取代。在民间,农神为主管农业生产的神灵,如田神、田祖、田公田姥、谷田神等都属于农神。田祖就是传说中教百姓如何种田的神农,与社神、稷神的职责不同。史载:“田祖,始耕田者,谓神农也。”^[12]神农是中国古代最重要也是最受崇拜的农神。卫宗武诗曰:“但祈田祖去螟螣,愿如荆叟歌元丰。”^[13]欧阳修《田家》诗曰:“绿桑高下映平川,赛罢田神笑语喧。”^[14]田公田姥在民众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他们才是农民真正的衣食父母,直接掌管着土地的收成,更为直接地与民众的生产生活联系在一起。舒岳祥《田公姥词》诗曰:“田公姥,生为农家夫与妇。寿考百年作田祖,岁岁田头管风雨。春三秋九享鸡豚,环玦神灵如对话。田公姥,听依歌,看依舞。使我仓有稂,使我庾有秬,使我困有黍。使我富牛羊,千斯疇兮百斯牯。田公姥,依肴芬兮依酒漚漚,官税既输兮公役不烦。”^[15]

在宋代,蚕农供奉的行业保护神为蚕神,又有先蚕、蚕官等称呼。如汪藻《蚕妇行》诗曰:“三眠欲食春已老,旋炊新麦祀蚕神。”^[16]陆文圭《栽桑》诗曰:“满笼新丝白雪香,听赛蚕官鼓声乐。”^[17]宋代饮茶之风颇盛,对茶叶的种植也很重视。宋代茶农供奉的行业保护神为茶神。周必大诗曰:“暮年桑苎毁茶经,应为征行不到闽。今有云孙持使节,好因贡焙祀茶神。”^[18]每年春茶开采之前,按例都要祭祀茶神。宋代畜牧业的保护神为马祖。《宋史》有载:“马祖。《祀典》,仲春祀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马社,仲冬祭马步。”^{[4]卷103.2522}

在农事活动中,宋代农民还常常通过占卜预测神的意旨,以期对他们的生产活动有所指导。如章甫《田家苦》诗曰:“雨师懒病藏不出,家家灼火钻乌龟。前朝夏至还上庙,着衫奠酒乞杯瓊。”^[19]因为久旱无雨,心急如焚的农民借助龟壳占卜何时降雨,还到庙里掷杯瓊卜阴晴。如毛珣诗曰:“去年一涝失冬收,逋债于今尚未酬。偶为灼龟逢吉兆,再供租约赁耕牛。”^[20]春耕之际,佃农对是否租牛难以决定。若是租牛,万一收成不好,连牛租都还不起,但是不租牛的话又无法耕种。于是他们借助龟壳占卜,偶然得到丰年吉兆,终于鼓起勇气再续租约赁牛耕种。宋代民众在农事活动中常常进行占卜,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预测天时阴晴、年成好坏。宋代乡村社会,农事占卜的方法相当多,如有龟卜、茅卜、竹卜、羊卜、鸡卜、蚕卜、杯瓊卜、扶乩等。

宋代还有用甲子日占卜天气阴晴的方法,宋人认为甲子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常以每个季节甲子

日的天气情况,来预测整个季度的气候和农业收成。陆游《甲子日晴》诗作对此有所记载:“泽国多春雨,阅月殊未止。皇天俄悔祸,畀以晴甲子。”^[9]卷45.2796 宋人还用立秋日的阴晴占验收成,这在南方地区比较多见。如吴地农民以立秋天气晴朗为吉,若这天有雷鸣则为凶兆,就会有收成减少的可能。范成大《秋雷叹》诗曰:“立秋之雷损万斛,吴侬记此占年谷。”^[21]如果在占卜中得到吉兆,农民往往会欣喜异常。如释文珙《野外即事》诗曰:“田蚕杯琰好,欢声动林垧。”^[22] 黄大受诗曰:“酺酒卜筮杯,庶和神灵歆。得吉共称好,足慰今年心。”^[23] 杨万里有诗曰:“心知茧卜未必然,醉中得卜喜欲癫。”^[24] 这些吉兆被人们认为是神的意旨,有了神灵的保佑,就能以良好的心态去面对农业生产中所遇到的困难。

三

农业信仰活动还丰富了宋代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例如,每年都要举行的“春社”和“秋社”仪式是民间最重要的农事节日。平时辛苦劳作的人们在这一天放松身心尽情狂欢。社日总是在祭祀土地神的祭祀仪式中开始,又是在酣畅淋漓的娱乐酒醉之后结束,到场都洋溢着这淳朴的民风民俗,真正成为了百姓公共性的娱乐节日,名为娱神,实为娱人。可以说,祭祀是农业生活的需要,是宋代民众情感的表达方式。一些农业祭祀仪式还出现了意义上、功能上的转化。一些农业祭祀逐渐演变成了农业生产习俗,一年四季日常生活中的农业祭祀则变成了岁时习俗。如为渲染气氛,祭祀社神时人们会演出一些精彩的歌舞,称为“社戏”,往往吸引大批民众前往观看。久而久之,庙会由此形成,其时间也逐渐不限定在社日,庙会成了农民和手工业生产者交换物资的重要场所。如四川地区例于每年新春举行的“蚕市”,本是一种祈求蚕业兴旺的集会活动。史载:“蜀蚕丛氏王蜀,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每岁首出之,以给民家。每给一,所养之蚕必繁孳,罢即归于王。王巡境内,所止之处,民成市,蜀人因其遗事,每年春有蚕市也。”^[25] 到宋代,“蚕市”已演变成买卖农桑用具的交易场所。如田况《五月蚕市诗》曰:“齐民聚百货,贸鬻贵及时。乘此耕桑前,以助农绩资。”^[26]

宋代农业信仰还在维系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的正常运转方面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信仰是法律之外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力量。在很多时候,法律并不能完全约束人们的一切行为,民间信仰的善恶观、道德观和戒律却能控制人们的行为。俗话说:

“抬头三尺有神明。”多数宋人认为,一个人如果与人为善,他就会赢得神灵的赞赏和恩惠,使其粮谷丰收而安居乐业。如果为非作歹,就会遭到神灵的惩罚,使其遭灾受难。如宋人认为雷神不仅与降雨有关,它还是惩恶扬善的正义之神。人们相信,如果作恶多端,就将遭到雷神的严厉惩罚。《夷坚志》里就有一些描述恶人被雷击死的事例。为了过上好日子,人们倾向于安分守己生活,希望得到的是神的保佑,而不是神的惩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邪念。宋代农业信仰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宋代民众便认为蛇、蜥蜴、青蛙等动物都与降雨有莫大关系,因此崇奉这些动物为神灵,在现实生活中不会轻易捕杀这些对农业生产极为有益的动物,这也会对农业生产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宋代,乡村社会盛行的民间信仰活动也会对农业生产有不利影响。如有的地区在祭神仪式中大量杀害牛畜,以作祭品之用。更有甚者,一些落后地区还有杀人祭鬼的陋习,这些无疑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后果。另外,活跃在乡村社会里的巫覡在祭祀、占卜等信仰活动中,往往担任重要角色。一些巫覡利用民众不惜钱财祭祀神灵的心理,借祭祀活动乘机敲诈勒索,如“雅州之俗右鬼神,而巫覡凭依祸福,勒民财以自利。”^[27] 针对巫覡活动造成诸多社会问题,宋政府曾进行了多次声势浩大的排巫、禁巫运动。如天圣元年(1023)十一月,夏竦在江南西路洪州任官,就捣毁淫祠,禁绝巫覡,勒令巫覡一千九百余户改业为农或学习医术,并上书朝廷,敦请厉行禁巫。^[28] 宋仁宗对夏竦的建议非常重视,下诏“禁两浙、江南、荆湖、福建、广南路巫覡挟邪术害人者。”^[4] 卷9.179 可以说,宋政府的禁巫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四

对于宋代农业生产普遍存在的民间信仰,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迷信活动。可以说,农业信仰是宋代民众生存的一种适应性策略,是支配宋人生产和日常生活的精神力量。心理学研究证明,在面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情绪高涨、充满信心的人比情绪低落、徘徊犹豫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功。在祭祀神灵的仪式中,经常要面对烈日的曝晒、跋涉的艰辛、礼仪的繁琐等困难。当祭祀神灵活动举行后,过程的艰辛使得他们对于将有所回报充满信心,并认为自己将会得到神的保佑。同时,农事祭祀活动往往还具有整合群体的作用。在自然灾害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极其渺小的,农事祭祀活动把全村甚至是

全社会凝聚在一起。如祈丰岁、去水旱事关一个地方民众的生计和生存,成为民众最重要的地方性集体活动,这对大家通力合作、团结一致,共同克服困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研究表明,凝聚力群体较松散性群体具有较高的生产率。通过这些集体祭祀活动,每个人惶恐不安的心灵都得到一种莫大的慰藉,这种心理暗示有利于积极心态的形成,帮助人们平稳渡过难关。

[参考文献]

- [1] 皮庆生. 材料、方法与问题意识——对近年来宋代民间信仰研究的思考[J]. 江汉论坛, 2009(3): 74-79.
- [2] 苑利.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我们所需注意的几个问题[J]. 农业考古, 2006(6): 168-175.
- [3] 毛萁. 毛诗: 第14卷[M]. 中华再造善本.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 [4] 脱脱, 等.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5.
- [5] 梅尧臣.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 第12卷[M]. 朱东润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164.
- [6] 邱云飞. 中国灾害通史: 宋代卷[M].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8: 10.
- [7] 陈襄. 古灵先生文集: 第3卷[M]. 宋集珍本丛刊本.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67.
- [8] 李龠. 剪绡集: 下卷[M]. 宋集珍本丛刊本.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356.
- [9] 陆游. 剑南诗稿校注[M]. 钱仲联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10] 苏轼. 苏轼诗集: 第13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622.
- [11] 李纲. 梁溪先生文集: 第15卷[M]. 宋集珍本丛刊本.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371.
- [12] 李昉. 太平御览: 第821卷[M]. 四部丛刊三编本.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5.
- [13] 卫宗武. 秋声集: 第2卷[M]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799.
- [14] 欧阳修. 欧阳永叔集: 第11卷[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8: 78.
- [15] 舒岳祥. 阆风集: 第2卷[M]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694.
- [16] 傅璇琮等. 全宋诗: 第1437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6560.
- [17] 陆文圭. 墙东类稿: 第17卷[M]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250.
- [18] 周必大. 周益公文集: 第7卷[M]. 宋集珍本丛刊本.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596.
- [19] 章甫. 自鸣集: 第3卷[M]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354.
- [20] 陈思. 两宋名贤小集: 第310卷[M]. 宋集珍本丛刊本.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323.
- [21] 范成大. 范石湖集: 第28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389.
- [22] 释文珩. 潜山集: 第1卷[M]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394.
- [23] 张豫章. 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 宋诗卷23[M]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504.
- [24] 杨万里. 诚斋集: 第5卷[M]. 宋集珍本丛刊本.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16.
- [25] 高承. 事物纪原: 第8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06.
- [26] 扈仲荣. 成都文类: 第9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78.
- [27] 蔡襄. 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 第34卷[M]. 宋集珍本丛刊本.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237.
- [28]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第10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2341.

Research on the Folk Belief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Song Dynasty

CHEN Wei-qing, MA Guo-hua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material production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in our country. In Song Dynasty, the agricultural belief was a common folk phenomenon of popular culture, which has a steady mass basis in the local community. Its purpose is to tend to suspiciousness and to avoid misfortune, to pray for well-being. The agricultural belief created positive influences on adjusting psychology of the general public, stabilization of social orders, and protection of natur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Song Dynasty; agriculture; belief; the rural society